

## 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

亲赴长春与关东军勾结

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，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，建立伪蒙疆政权的正式开始。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“蒙政会”，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，并且蒋介石杀了我的得力干将韩凤林，令我非常不满，又加在西公旗事件和特税问题上，我与绥远当局的斗争也着着失败，使我更为气愤。因此，在百灵庙“蒙政会”时期，我就和日本方面暗行拉拢，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，扩充实力，以达成建立“蒙古国”的妄想。到了 1935 年冬，我便亲自出马，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。这时我由百灵庙返锡盟苏尼特右旗，日本关东军特来电报邀我前往伪满新京（即长春）商谈要事，我即偕同迪力瓦、陶克陶和驻在我旗（苏尼特右旗）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宍浦、中岛万藏等乘飞机前往，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西尾参谋长。旋即和板垣副参谋长、田中隆吉参谋等商谈，结果商定：日本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“独立局面”，继而建立“蒙古国”，并送给 50 万元和 5000 支枪，作为扩编军队之用。

我由长春返旗后，就和宍浦商量关于搞“独立局面”，成立统一机构问题。宍浦建议说：“现在日、蒙既经合作，统一机构必须从速建立，我看最好是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

委员会（简称蒙政会），作为统一指挥机构。因为这样做是承认已成事实，易于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。”当时我认为这事有和蒙政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（云王）研究的必要，就带了 10 万元前往百灵庙交到“蒙政会”上，作为扩编保安队之用，并向云王报告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。云王说：“既然这样做了，就应本着‘怕就不做，做就不怕’的精神继续进行，但必须慎重从事，力求稳妥为宜。”接着我又说：“现在亟须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。一个办法是成立‘蒙古军总司令部’，一个办法是强化蒙政会，你看哪一个办法好？”云王说：“在你盟（锡盟）那边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，联络上较为方便；在百灵庙这边强化蒙政会，作为统一指挥机构，不大方便。”意思是怕傅作义反对。

我由百灵庙返旗后，适田中隆吉来和我商谈这一问题，我提出要成立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，强调这是我和云王商洽所得出的意见。田中隆吉主张成立“蒙古军政府”，强调这个名称响亮，包括政治和军事，可以指挥行政和部队。讨论结果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，他就急于要走，说是主持进攻察东之事。我就着手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。

#### 日寇策划进攻察东经过

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，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军司令部，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，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。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进犯察东的借口，故意挑起了张北事件。扮演张北事件的主要角色的山本信亲说：“张北事件是多伦特务机关故意制造的，根据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，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，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。但在 1935 年夏，我和日本商人三名，由多伦前来张北，未带察省政府的护照，强要进城，守城士兵阻挡，不令通行，因而发生口角，被守城卫兵把我等押解到察

省部队中看守。张家口领事馆得讯后，强调这是对日本人的侮辱，提出强硬的交涉。”经中、日双方进行谈判的结果，在缔结协定条款中规定宋哲元的正规军从张北、宝昌、康保、商都、沽源等县撤出，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。这样一来，察东便成了“特殊化”地带。日本关东军就乘此机会，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，促使李守信率队于 1935 年冬进犯察东。当进犯沽源时，当地保安队曾奋勇抵抗，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陈宝泉击毙。李守信又加强兵力进攻，并有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助威，投弹轰炸，当地保安队终因兵力单薄，陆续撤退，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六县，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，进驻张北县城。此时需要建立行政机构，统辖所属旗县，当由我以“蒙政会”名义下令成立“察哈尔盟公署”，任命卓特巴札普为盟长，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，并定于 1936 年 1 月 1 日举行“察盟公署”成立典礼。

#### 白云梯、吴鹤龄之来

这时国民党中委白云梯落选，政场失意，潜住天津，想来蒙地活动。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，特派中岛万藏乘坐飞机，前往天津把白云梯接到我旗，意在拉他下水，以资号召。吴鹤龄也因活动国民党中委未成，欲来蒙地活动。但吴鹤龄这个人心眼多，为了取得蒋介石的谅解，好脚踏两只船，特去面见参谋总长朱培德说：“听说德王已和日本拉上关系，蒙政会那边情况可能有变动，我想去一趟，劝说他不要胡闹，别上日本人的当。”朱培德当时将他这一套活动转达了蒋介石，蒋即召见吴鹤龄说：“你要去蒙地走一趟是可以的，但务要随机应变，能够设法制止日本西进更好，如不能制止时，能够设法使其缓向西进就行。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就算完成了你此行的使命，也算你的一项功劳。”（这段话是吴鹤龄在日本投降后，才告知我的。）于是吴鹤龄便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委尼玛鄂特索尔（尼冠洲）衔着蒋介石

赋予的使命，离南京北上。他们到达北平时，我正在百灵庙，曾接到吴鹤龄要来的电报，我复电欢迎他速来，就回归我旗。

陶克陶特向我报告说：“听说吴鹤龄来，要从中破坏蒙、日合作，日本方面决定要处置他。”我听到陶克陶的报告后，就去特务机关找宓浦说：“我听说你们有处置吴鹤龄的计划，千万不可这样做，因为吴鹤龄是我叫他来的，希望他帮助我们工作，你们要处置他，对于以后蒙古人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影响不好。”宓浦答复我说：“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见，决不处置他。如果蒋介石的蓝衣社派人把他杀了，可与我们无关。”我觉得宓浦的话仍有杀害吴鹤龄之意，遂将此事告知迪力瓦，希望他出些主意。迪力瓦很郑重地提醒我说：“吴鹤龄曾与你意见不和，发生过冲突，如果这次被日本人所杀，外界可能怀疑是你所为，你就有口难辩，怎么也洗刷不清了。务要从速电知吴鹤龄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张北，你好从中保护。”我很以迪力瓦之言为是，即给吴鹤龄去电报，约定务于 1 日正午 12 时即“察盟公署”举行典礼时到达张北，万勿有误。迪力瓦旋又向我叮咛嘱咐说：“你仅约定时间在张北与吴鹤龄见面，以便从中保护，我认为还不够周密，应该派可靠的人率同卫队前去保护，接他来王府才妥当。”我遂又派李秀山率同卫队乘坐大汽车一辆，前往张北保护吴鹤龄，并接他来我旗。我即偕同达密林苏龙，乘坐飞机到达张北，这时尼冠洲已先期到达，吴鹤龄果也如约前来。见面之后，我很想把日本人方面预谋杀他的消息告知他，但这时李守信、卓特巴札普和田中玖（日本人）等都来和我周旋，我又去李守信的部队中送去劳军费一万元，紧接着又参加了“察盟公署”成立典礼，总未得到机会和吴鹤龄个别密谈。举行典礼后，我又催促吴鹤龄速赴我旗，吴还强调说：“你知道我是一向素食的人，虽然带有厨子来，还得整理一下用具，忙什么要走呢？”我很着急地

触动他的衣襟说：“现在你要听我的，我叫你走，你就快走，万勿延误！”尼冠洲在旁也劝吴鹤龄说：“德王爷很诚意地劝你走，你就走吧，不要固执啦。”谈至此，我即赴飞机场乘飞机返旗。

吴鹤龄也在李秀山率队保护下，偕同张绍庭、于宝恒等乘坐汽车起程，到达城门时，因未持出城许可证，守城警兵拦车不准通行。吴鹤龄当即派员到“察盟公署”托请尼冠洲取到出城许可证，守城警兵始验证放行。车开出張北几个小时，天又傍晚，快到化德时，见后边有汽车灯亮，似在追赶，因吴鹤龄所乘汽车速度较快，后边汽车灯光不久就看不见了，当晚宿于化德。

这时宝贵廷正率一团士兵驻守化德，他的日本顾问烟草谷，接到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扣留吴鹤龄的密令，即催促宝贵廷执行。宝贵廷婉言拒绝说：“吴鹤龄不是到别处去，而是到德王府去，德王并派有卫队保护，我不能下手扣捕，如果非要扣捕他不行，可以径向德王交涉。”烟草谷见宝贵廷不执行，急得直跺脚说：“这是特务机关长的命令，如果不执行，就要受到处分，非执行不可。”宝贵廷说：“我如执行这个命令，无法向德王交代。并且吴鹤龄跑不了，要抓他很容易，何必急于在此地扣捕。”烟草谷见宝贵廷坚不执行，虽然十分着急，但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才伸入西蒙，尚须尊重蒙系军官的职权，迁就宝贵廷的意见，不能以顾问资格直接指挥士兵，他手下虽有几个亲信随从，也不能把拥有几十个卫队的吴鹤龄扣捕，遂即作罢。吴鹤龄才得以在德化安全度过一宿，翌晨乘车到达我旗。我当即安排他住下。

吴鹤龄到我旗第二天，我把接到尼冠洲被杀的电报转给他看，他才恍然大悟，特来见我说：“我在南京已给蒙政会要下十万元的建设费，本想领到后再来，但是接到你的电报，嘱我不要候领十万元，务要从速前来，这次又这样地保护我，你把我看得

比十万元还重要。”他这样来表达他对我感谢的心情。我当即安慰他说：“这是我很需要你帮助的，所以希望你从速前来。这次对你略尽保护之责也是应当的，何必感谢，今后希望你安心居住，不要顾虑。”

### 尼冠洲被杀事件经过

尼冠洲是明安旗的佐领，为卓特巴札普的得力助手，时常代表察哈尔盟到外边进行联络。尼为人擅长辞令，善于交际，好作政治活动，因此名望逐渐提高，成了察盟中头角峥嵘的知名人士，在国民党政治场合中，都视他为蒙旗地方上有力人物。吴鹤龄一向同他过从甚密，引为知交。他当选国民党中委后，吴鹤龄当然更和他拉近，以资互相支援。吴鹤龄衔蒋介石使命，前来蒙地活动之事，可能是与他共同商量后所作的，所以，他们二人一同离南京北上。到达北平时，尼冠洲还以新当选国民党中委资格，对来访问记者发表谈话，表示此次来蒙，是为了宣抚蒙旗归向中央，因此，就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。当他来到张北后，卓特巴札普倚为自己的惟一臂助，委以“察盟公署”总务厅长之职。日本方面也知尼冠洲是“察盟”的有名人物，拉他下水参加“察盟”工作，在政治上可能引起一定的作用，也同意他任此职。尼冠洲因新当选国民党中委，当然倾向国民党中央，表示推托不就，却劝说卓特巴札普勿受日本人愚弄，要有自己的主张，特别是在参加“察盟”会议上，提出很多为日本方面所不愿接受的问题，更引起日本人的嫉恨。

据吴鹤龄对我说：在参加“察盟公署”成立典礼时，尼冠洲指着成吉思汗遗像前所供的九只羊说：“我们蒙古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这九只羊供品，其他一切都是日本人所做的，都受日本人操纵把持，我看你跟我回到张家口过年去吧。在此地能够干什么。”假如这话为日本方面侦知，当更对尼冠洲嫉恨在心，定要置之于

死地而后快。

我从陶克陶的报告中，仅知日本特务机关要处置吴鹤龄的消息，不知有杀害尼冠洲的阴谋。同时我更认为，尼冠洲有卓特巴札普的保护，不致发生意外，所以只顾保护吴鹤龄的生命，没有注意尼冠洲的安全。在我返旗后不几日中，白云梯借故要去张家口，尼冠洲也要返回张家口度春节。白云梯之走，虽未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，尼冠洲返张，却招致日本方面的怀疑。认为他从中破坏“日蒙合作”，会泄露机密。日本特务机关遂决心暗下毒手杀害他，预先派出警兵，换穿便衣，冒充土匪，在万全坝上埋伏等候。当白云梯和尼冠洲分乘汽车先后到达万全坝上时，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，持枪拦住走在前面白云梯所乘的汽车，打开车门，略加询问，即行放过。接着又持枪拦住尼冠洲和梁芝祥所乘的汽车问道：“哪位是尼委员？”尼说：“我是尼委员。”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又说：“请尼委员下车，我们有话说。”尼遂下车，当即被一枪打中要害身死。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，遂弃尸道旁，扬长而去。对梁芝祥却未加追问，仅受一场虚惊。后来梁芝祥对我谈述这个惨案经过时，犹有余悸。

尼冠洲被杀后，外界曾有谣传，说尼冠洲当选国民党中委后，蒋介石曾召见他，告知对日进行妥协计划，叫他北来和日本方面暗中接洽进行，嗣又怀疑这个人不可靠，深恐泄露机密，遂又派蓝衣社人员将尼冠洲刺杀，以达灭口。据我推测，这个谣传是日本特务机关故意散布的烟幕，掩盖他们暗杀尼冠洲的阴谋。由此可见，日本帝国主义不但用阴谋毒辣手段，把尼冠洲置之于死地，而且散布阴险欺诈的烟幕，以欺骗、愚弄蒙古人。

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

“察盟公署”虽经成立，毕竟是地方政权，仅能指挥所属旗、县，不能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。为了成立统一的指挥机

构，我从张北返旗后，就从百灵庙“蒙政会”调来中坚干部超克巴图尔（陈绍武）、赛吉尔胡（丁我愚）、玛哈希力（赵文儒）、乌勒吉图（张秉智）、札拉嘎木吉（白景畲）和原在我旗的陶克陶、金永昌、于兰斋、补英达赖、郭尔卓尔札布等，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工作。决定改元易帜，用成吉思汗纪年（经查对《王公表传》，这年正是成吉思汗七百三十一年），制定蓝地右上角红、黄、白三条为象征的“蒙古旗”，表明脱离了中国的辖属，走上“独立自主”的道路。实则是走上背叛国家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。

经过积极筹备就绪后，即定于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日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。典礼是在我的王府大蒙古包中举行的，一切都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，在大蒙古包中正面悬挂起成吉思汗遗像，遗像上面挂着很长的哈达，遗像下面供桌上摆着九只整羊及其他供品等物，蒙古包门上交叉竖起两面“蒙古旗”。典礼开始时，规定一律实行叩拜礼。我率领蒙古职员向成吉思汗遗像行了叩拜礼后，参与典礼的日本人宍浦、前川等也跟着行了叩拜礼。我看到这种情形，真是得意忘形、欣然自得，便向坐在我旁边的郭尔卓尔札布说：“你看日本人都向我们祖先磕头了！”行礼后，我就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资格宣读“誓辞”，“誓辞”的主要内容是：“我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，收复蒙古固有疆土，完成民族复兴大业。”我宣读誓辞后，本来预定由关东军西尾参谋长代表日本方面致“祝辞”，只因这天降雪甚大，天气不佳，他没有及时赶到，暂行宣布散会后，西尾才乘飞机来到我旗，乃再召集职员开会，西尾遂当众宣读“祝辞”。祝辞大意无非是“日蒙携手，亲密合作”等语。但他“祝辞”中所提到的是祝贺成立“蒙古军政府”，不是祝贺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的成立，这又说明在名称上还没有统一起来，仍然“各行其是”。



西尾致“祝辞”后，就摆上全羊席招待他，宴会后，他就乘飞机走了。

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，我就责成陈绍武等制定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和安排主要人事。因甚感人手不足，特从伪满约来仓都仍（包海明）、璦门达赉（高庆春）、图木勒巴特尔（刘定一）、恩和阿木尔（包崇新）等，由北平约来特克希卜彦（王宗洛）、莎彦毕勒格图（陈靖寰）、那苏图（王庆三）、忽克金（陈化新）等。在组织大纲中，规定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最高首领为总司令，大家推举我担任总司令，李守信为副总司令，下设军务、政务两部和一秘书处，另外还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，负“指导”军事、政治之责。军务部长派李守信兼任，其下设一、二、三课。第一课课长敖云章（未到任），第二课课长王宗洛，第三课课长于兰斋，分管军政、军令、军法、军械、军需、参谋、作战等事项。政务部长由我自兼，其下设内务、财政、文教三处。内务处长金永和，财政处长包悦卿，文教处长郭尔卓尔札布，分管民政、礼俗、宗教、文化、教育、财政、交通、实业等事项。秘书处处长补英达赖，下设一个秘书室和文书、人事、会计、经理四科。机要秘书陶克陶，秘书陈绍武、丁我愚，文书科长赵文儒，人事科长张秉智，会计科长旺尔克札布，经理科长孟昭义。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。军事顾问山内，财政顾问稻茨，文教顾问崛井德五郎。这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阵容。这时吴鹤龄因日本方面还不谅解，没有派他担任重要职务。

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，首要的工作是招募士兵，扩编军队，除派宝贵廷、乌云飞赴卓、昭两盟继续招兵外，并派包悦卿赴哲盟招兵。其次，因是年锡盟大雪成灾，成立了雪灾救济委员会，以郭尔卓尔札布为主任，发出通电呼吁救灾，募集救灾款。

这年冬末春初之际，降雪甚大，天气奇寒，平地积雪尺余，草原多被覆盖，水井为之冻结，牲畜遭受冻饿而致死者甚多，牧民生活受了很大影响。因此，一面派员赴伪满募集赈款，一面通过“善邻协会”在日本国内募捐，并用“雪灾救济委员会”名义，向国内各界呼吁救济。结果从日本和伪满方面募到赈款二十余万元，从国内募到赈款四万多元，由赈济委员会华北方面负责人何绍南，亲自送到百灵庙“蒙政会”一万余元。关于这项赈款的使用，我采纳了吴鹤龄的建议，决定集中使用，不可分散救济。所以这项救济款并未用在救灾上，以后由吴鹤龄把持，用来作为毫利希亚（蒙语，其意为合作社）的资金，不仅吴鹤龄借此大发其财，就是他的手下人罗厉甫、戴宗元也成了富翁。罗厉甫在北京广置房产，大开商店，成了有名的罗二爷。

#### 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

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换成了浅海少佐。这个人飞扬跋扈，粗暴蛮横，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充分暴露出来，居然以征服者神气出现，对我指挥命令，毫无礼貌，对蒙古族职员更是采取高压手段，见面非打即骂。大家初则避之，不敢挫其锋，继因浅海的蛮横态度，有加无已，均表不满。有一次在冰天雪地中，浅海召集全体职员讲话很久，冻得大家手颤腿战不能支持，接着他又进行考试，就地出题，限时答卷，看见有的人站立姿态不稳，就掴耳光，或用拳头猛捶其胸，简直把蒙古族职员当牛马看待。由于浅海对人的态度蛮横，引起大家的极度愤慨，纷纷来向我表示不能忍受浅海的侮辱。有人提出：这是复兴蒙古，还是出卖蒙古？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，还是裕仁的奴仆！要求离职回家，不愿在此地工作，以免时遭侮辱。有的主张与浅海抗争，不要示弱。我与陈绍武等研究对付浅海的对策，认为浅海的态度蛮横，定有接近他的蒙古族人为之出谋划策。而当时通晓日语接近

浅海的蒙古人中只有金永昌和陶克陶二人，并认为陶克陶还在青年，不无一点血性，不致出此下策；而金永昌一向对浅海低声下气，表示恭顺服从，并常为浅海当蒙语翻译，宣扬浅海的好处，他可能对浅海献策：在日“蒙”合作开始时，应当用高压手段和严厉态度，对待王公和青年，以树立威严，便于今后压服、控制。陈绍武向我建议，为了对付浅海的蛮横，安定大家的情绪，一方面在金、陶二人之中，必须拉一个、打一个，陶克陶虽是关东军的“嘱托”（日语原意也为委托办事，但在此是一个职称，指专为日本特务机关搞特工），毕竟还是青年，易供你的驱使，而金永昌老奸巨猾，不易受你的驾驭。为今之计，应当拉陶排金，并向陶克陶说明我们团结起来是反对浅海，不是反对日本，叫他向关东军反映浅海的粗暴蛮横，影响“蒙日合作”甚大，应当从速调离其职务。另一方面，并应召集中坚干部秘密会议，号召大家“加强团结，努力民族事业”。我很以陈绍武的意见为是，表示同意这样做。同时我对浅海的做法和金永昌的行为，也是不满的。因为我原来是妄想利用日本的势力，实现我的“统一蒙古”、掌握大权的野心，还以为自己不是日本的傀儡呢。金永昌在浅海面前卑躬屈膝，阿谀奉承，我很看不起他，对于陶克陶却有好感，因他曾向我透露日本特务机关谋杀吴鹤龄的消息。对于浅海的做法和态度我更是不满意的。他任我旗特务机关长后，曾去乌珠穆沁右旗面见索王说：“今后蒙古的事情完全由德王负责去做，希你不要从中阻挡。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对索王的恫吓，对我的支持，但我认为他这种说法很不妥当，因为索王一向对日本没有好感，不愿与日本“合作”。经我采用很多办法，才说动他同意“蒙日合作”。我认为对他应当迁就和尊重，以资号召，不意浅海竟出以威胁恫吓之意，这会使索王怀疑浅海对他的恫吓是出于我的教唆，会离间我和索王之间的感情。同时我也感到浅

海的态度非常蛮横，对我毫无礼貌，动辄指挥、命令。因此，我就同意了陈绍武拉陶排金、反对浅海的建议，由陈绍武拟具一个以“加强团结，拥护领袖（指我），内除奸细（指金永昌），外抗强权（指浅海）”的誓词，在我王府的西跨院房内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，张挂成吉思汗像，备有奶酒。计被邀签名参加者有陶克陶、陈绍武、丁我愚、赵文儒、孟昭义、刘定一、包崇新、白景畬、王庆三、张秉智、包海明、高庆春、吾力吉卜林、陶克托胡（陶布新）等。首先由我发言，大意是“忠心为蒙”，不畏强权等语。继而宣读誓词，由参加者签名画押后，面对成吉思汗像，举手宣誓，痛饮奶酒，大有歃血为盟之势。会后我切嘱大家，必须严守秘密。

经过这次会议，果然得到了效果。一般干部便由动摇中安定下来，对浅海的蛮横态度，多置之不理，有时也起而抗衡。浅海对人的态度也较为缓和。迁至化德时，日本关东军即将浅海调走，另派田中玖为特务机关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在这个问题上，犯了很大错误，并有罪恶。我投靠日本，浅海就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，当即招致蒙古族青年的不满。我搞的所谓“独立局面”，大有“树倒猢猻散”之势。这本来已经值得我深思和觉醒，但我为政治野心所驱使，正在陶醉于“蒙日合作”之中，认为浅海既然态度蛮横，换一个态度温和的特务机关长或可好一点。结果赶走了态度蛮横、做法强硬的浅海，换来了一个貌似温和、手段毒辣的田中玖，还是照样执行侵略蒙古的政策。我运用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宣读誓词的方式，麻醉了蒙古族青年，使大家从动荡中安定下来，跟我一同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上，既误了很多蒙古族青年，又断送了西部蒙旗，真是罪莫大焉。

## 二

在乌珠穆沁旗召开“蒙古大会”

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后，由于僻处牧区，交通不便，指挥失灵，非常影响工作的进展。并因人口稀少，物资缺乏，房屋不多，在供应和居住上多感困难。而且我曾听到田中隆吉说过：西尾参谋长参加典礼后说，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，人口稀少，一片荒凉，怎能成立“蒙古军政府”。这时吴鹤龄也向我建议：“既然日本关东军喜欢‘蒙古军政府’这个名称，我们就成立‘蒙古军政府’吧，何必强调非叫‘蒙古军总司令部’不可，弄得在名称上不一致！”同时我感到，关于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、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成立之情形、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，均有向各盟旗报告和讨论之必要，于是就责成吴鹤龄拟具成立“蒙古军政府”和建立“蒙古国”草案。在建立“蒙古国”草案中，特别强调领土完整、主权独立，要以原有盟旗（包括东、西盟旗）为领域，以葫芦岛为海口。恰好这时田中隆吉又来我旗，我就将建立“蒙古国”草案交给他，请他转交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。当时他把这个草案随手放在衣兜里，可能未向关东军反映，后来到了化德，他又把这个草案原封未动地交给我说：“此事以后再说，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绥远，只要把绥远拿下来，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。”

我和吴鹤龄等研究，为了讨论“蒙日合作”及今后如何开展工作问题，亟须召开一次有西盟全部盟旗参加的“蒙古大会”，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，决定于 1936 年 4 月 24 日在乌珠穆沁右旗，召开第一次“蒙古大会”。这样决定之后，就以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名义，下令锡、察两盟各旗札萨克

和总管，务要亲自参加；以“蒙政会”名义，通知乌、伊两盟各旗及阿拉善、额济纳、土默特等旗，派主要人员参加。届时到会参加者，计锡盟有我和索王、松津旺楚克、雄诺敦都布、林沁旺都特、巴拉贡苏隆、索特那木道尔吉、多布敦、道尔吉、桑都克道尔吉、贡桑等。察盟除察西四旗未派员参加外，察哈尔东部八旗都参加了，计有卓特巴札普、特穆尔博罗特、哈斯瓦齐尔、色楞那木济勒、穆克登宝、补彦、阿由尔札那、萨穆丕勒诺尔布等。乌盟参加者有沙拉巴多尔济、葛什克达赖等。并把在“蒙政会”秘书厅任科长的伊盟达拉特旗人那逊德勒格尔约为伊盟代表，把在“蒙政会”实业处任科长兼参议的额济纳旗人苏宝丰约为额济纳旗代表，还把阿拉善旗前来“蒙政会”洽领枪械的陈那逊巴图约为阿拉善旗代表。李守信、吴鹤龄、金永昌、于兰斋、陶克陶等以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的军政首脑资格参加。这时吴鹤龄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，特利用他的岳父于华亭（是卓盟喀喇沁右旗闲散王公，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）与索王的旧关系，尽力说劝索王同意和日本“合并”，亲自参加大会。索王非常讨厌日本帝国主义，但这时看到“蒙日合作”已成事实，就听从了吴鹤龄的劝说，同意了的做法。我听说索王曾向他旗的协理图桑阿表示说：“现在已做成这个样子了，德副盟长这样做自有他的见地和他的道理吧，今后我们不必干涉他了，任凭他放手去做吧。”

吴鹤龄在大会筹备工作上，出谋划策，审查提案，表现得特别积极活跃。在部分代表到达之时，他曾和我说：“代表已经到了大部分，不能叫他们闲着，闲着就要出问题，应当召集他们开会，招待他们宴会。开会宴会，宴会开会，这是我在南京跟国民党学到的一套办法。”因此，他就和到会的代表们整天开会，讨论问题。迨到代表们到齐举行预备会议时，推选我和索王、李守

信、卓特巴札普、沙拉巴多尔济为首席团成员，吴鹤龄在大家推举下担任大会秘书长。他在掌握会场、进行讨论、通过议案中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在预备会议上，先酝酿协商主要议案，次又有人提出如何筹措军政各费。吴鹤龄主张，可向日本人借款 1000 万元，作为军政各费。这样协商和安排后，就在索王大蒙古包中举行正式大会，首由索王作简单的发言，说明召开此次大会的意义。继由我报告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，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成立及改元易帜的情形。接着就讨论议案，最主要的有下列各案：（一）关于建立“蒙古国”和先在嘉卜寺（化德）成立“蒙古军政府”，以资整军经武，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；（二）关于实行征兵，扩编军队，组织“蒙古军”案；（三）关于实行统制经济，开发资源案；（四）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，组织救济新村案。因在会前已经酝酿成熟，都顺利通过。嗣由吴鹤龄宣读察盟代表中提出将化德县改为“德化市”，由察盟划出归由“蒙古军政府”直辖案。卓特巴札普提出异议说：“化德是察盟统辖的一个县，是谁未经我这个盟长同意，竟敢‘张松献地图’，提出这个议案来！我是不同意的。”吴鹤龄看到这种情况，马上把原文又念了一遍说：“这个议案没有人正式签名盖章，应当另议。”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，这个议案就暂时搁下了。

在大会进行中，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、横山顺等乘飞机赶来参加，我向田中隆吉作了个别谈话说：“索王等最不愿意的是怕你们派来顾问，过问蒙旗行政，希你以来宾资格在大会上讲话时，说明现在派来的日本顾问是帮助蒙古筹备建国，以俟工作就绪，就将派来的日本顾问一律撤回，决不干涉旗政。”田中隆吉果然照我的嘱咐，在大会上讲了话，并将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，分赠各盟旗有实力的代表，以资拉拢。接着我们又向田中隆

吉提出，向日本借款 1000 万元问题。他答复说：“你们蒙古有石油矿吗？如有石油等矿源时，借款 1000 万元那是容易办到的。”从他这几句话里，充分透露出，日本帝国主义要把蒙古作为吸取原料、销售商品、投资赚钱的殖民地的阴谋。

田中隆吉在大会中看到吴鹤龄的活跃情形和所发挥的作用，对他非常重视，很想拉他为日本做些工作，曾向吴鹤龄说：“我们日本人中，曾经有人主持杀了尼冠洲，我认为这件事做错了，希你不要因此有所顾虑，今后应当放手进行‘日蒙亲善’工作，我想请关东军给你一个‘嘱托’，你的意向如何？”吴鹤龄推托说：“这是你对我的关照，但我对此没有什么意思。”田中隆吉当下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在面部上表现出不甚愉快的神色。

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，选出云端旺楚克（云王）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，索王和沙王（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）为副主席，参与大会的代表都在“选任状”上签名盖章，表示郑重，当晚即以全羊席招待田中隆吉、横山顺和参与大会的全体人员。会后由我率领一部分代表到百灵庙把“选任状”送交云王，并请他今后主持指导工作。云王表示：“我是年老力衰，德薄能鲜，深蒙大家推戴，无限感奋，希望大家共同去做，特别希望德秘书长（指我，我是蒙政会秘书长）多负责任。”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准云王辞去“蒙政会”委员长职务，调任国民政府委员，“蒙政会”由副委员长索王执行委员长职务，实际上由我负责。

### 成立伪蒙古军政府

第一次的“蒙古大会”召开后，我即派王宗洛率同职员数人前往嘉卜寺接收化德县房屋，进行筹备伪蒙古军政府工作。不意化德县小林顾问拒绝腾房，发生了波折；嗣经与化德县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交涉，才把小林顾问的气焰压下去，开始腾房，进行修理。经筹备就绪后，就于 1936 年 5 月 12 日举行伪蒙古军政府成



立典礼。参加典礼者除各盟旗代表和前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职员外，日本方面参加者有日本关东军今村副参谋长，田中隆吉参谋，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，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。举行升旗典礼时，首先由我讲话，说明依据“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”，成立“蒙古军政府”的意义。继由今村致“祝辞”，祝贺“蒙古军政府”的迁移，强调“日蒙亲善”，协同一致，完成“蒙古军政府”所负之使命。礼成后，即大排筵筵，招待日本来宾及各盟旗代表。

伪蒙古军政府人事安排，依照“蒙古军政府”组织法规定，由云王、索王、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，任命我为总裁，负实际责任，掌握军政大权，实行独裁制。总裁下设一个办公厅，参议、参谋两个部，军事、财政、内务、实业、教育、交通、司法、外交八个署，一个顾问部。办公厅主任补英达赖，军事署长王宗洛，财政署长德古来，实业署长王揖唐，内务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，交通署长于兰斋，司法署长特穆尔博罗特（特大海），外交署长陶克陶，教育署长金永昌，后将金永昌调任驻伪满代表，由郭尔卓尔札布继任教育署长，参谋部长李守信兼，参议部长吴鹤龄，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，军事顾问山内，财政顾问稻茨，外交顾问山本信亲，教育顾问崛井德五郎等。嗣因总裁工作繁巨，又设四个帮办，由李守信、吴鹤龄、补英达赖、陶克陶等担任，帮同我处理军政事务。并派陈绍武为内务署帮办，吉致祥为教育署帮办，帮同署长处理署务。后又增设一个侍从处，由丁我愚为少将侍从处长。乌古廷由伪满来蒙后，暂派为参谋部主任参谋。这是伪蒙古军政府的主要人事安排。

### 组织伪蒙古军

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，首要的是搞军事工作，就是招兵买马，扩充军队，由我亲自主持进行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

际工作。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，和由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，以及在锡、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，重新编为两个军，八个师，一个警卫师，一个炮兵团，一个宪兵队。伪第一军军长李守信，统率一、二、三、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，计第一师师长刘继广，第二师师长尹宝山，第三师师长王振华，第四师师长宝贵廷，直属炮兵队长丁其昌。伪第二军军长由我自兼，统率五、六、七、八各师，计第五师师长依恒额（依绍先），第六师师长宝彦图，后由乌云飞（突布格尔勒）继任，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，第八师师长包悦卿，后由札青札布继任，警卫师师长雄诺敦都布，后改为第九师由包海明继任师长，炮兵团团长王云五，宪兵队队长刘建华（那木尔），预定全部都是骑兵，总兵力约达一万余人。并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，特在我旗东营盘成立伪蒙古军官学校，由我自兼校长，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族青年，进行训练。

为了考验部队训练成果，特于是年九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，计参加被检阅的军队，除伪第一军派来部分部队外，伪第二军所属各师大部参加。由我亲自检阅部队分列式。日本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来参加检阅，表示满意。板垣旋即乘坐飞机分赴伊盟札莎克旗和阿拉善旗定远营，说是去见沙王和达王（达理札雅），做拉拢工作。我检阅部队后，赏给士兵每人银洋一元，以资鼓励。并事先派兵打来黄羊多只，就地野餐，表示慰劳。我参加阅兵典礼后，回想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，等于讨饭，今天要上几支枪，明天要上几门炮，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。这时凭日本的力量，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，万余骑兵，如再扩而充之，虽不敢妄想恢复成吉思汗伟业，也妄想把“蒙古民族复兴起来”跻身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，我自己也做一个“民族英雄”。幻想及此，真是自鸣得意，喜形于色，有些飘飘然了。

但在得意之中，不如意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。首先是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，以伪第一军经费不足为借口来威胁我。有一次他带着伪第一军的参谋长刘星寒前来见我，说是军费不足，叫我设法筹措。我知他是故意给我出难题，就赌气把伪第一军的经费都批准了，并增批了一些军费，反责成他也设法筹措。他看我面有愠色，也带着不耐烦的神气，一声不响地走了。又因伪蒙古军政府成立了公路局，任命张绍庭为局长，负责办理化德至张家口及各旗县之间的运输。一般商人都愿搭乘公路局的汽车，不愿搭乘日本“满铁”的汽车，以致“满铁”汽车公司生意冷淡。田中玖为了使日本人经营的“满铁”汽车公司垄断交通运输，赚取高额利润，曾向我提出不供给公路局汽油，由公路局自行购买，想用这个办法，迫使公路局停办歇业。我当时认为在张家口还能买到汽油，因而置之未理。不久田中玖走了，田中隆吉来了，才又供应汽油。更因我这时比较信任陶克陶，不信任金永昌，金永昌便和田中玖拉得很近，说我和陶克陶的坏话。

记得陶克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田中隆吉有一次把我叫去，正言厉色地向我说：‘田中玖说金永昌曾向他反映过，说你曾向蒙人表示，蒙古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跟谁都可合作，既可与日本合作，也可与外蒙合作。现在你说这话可不行。’我当时答复田中隆吉说：‘这话是以前在多伦多时，和金永昌等研究蒙古问题时说的，是在蒙日未合作以前的话，不是在蒙日合作之后说的。’田中隆吉反嗔作喜说：‘那时说的没关系。希你不要顾虑，我是信任你的。’”

陶克陶述说这话之后，又感慨地说：“我们的金永昌先生真厉害，如不是田中隆吉谅解我，我可能就遭田中玖的毒手了。”这又说明，田中玖是想用打击陶克陶的手法，去掉我的助手，给我颜色看，幸亏得到田中隆吉的谅解，才归无事。但这不是田中

隆吉比田中玖好，而是因陶克陶这时确实成为田中隆吉忠实的走狗，绝无另走外蒙古路线的意图，所以田中隆吉故意把这套话告知他，叫他感恩图报，进一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。

其次，令我不如意的事还有：（一）因为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，多是土匪、地痞、流氓、游手好闲之徒，纪律不好，在举行阅兵典礼时，竟在化德街上发生了抢案。士兵打人骂人之事，更是层出不穷，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印象。（二）在编制和配备上，各方意见很多，争要军马，争要装备，例如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是察盟人，利用地方上的关系，先购足了军马，第五、六两师的人就表示不满说：“我们师是先编制的，反而军马不足，有的部队仍在徒步。而第七师是后来编成的，却配备了足够的军马，很不公平。”意见纷纭，烦言啧啧，叫我很难处理，至感烦恼。（三）宝贵廷曾一度暂代伪第二军军长，迨发表他为第四师师长后，就解除了他暂代军长职务，因而对我也有怨言，向人发牢骚，我听到后也很恼火，想把他调到伪蒙古军官学校工作。并叫王宗洛暗地调查他有无煽动军心事情。王宗洛接受我的指示后，一方面告知王云五（王宗洛的胞兄）炮兵团长预作准备，以防不测；一方面调查宝贵廷的言谈行动。嗣后向我报告说，宝贵廷并无煽动军心、图谋不轨事情，仅在饭馆酒醉时发过牢骚，我才未调动宝贵廷的职务。（四）在征兵上，锡盟各旗都按照“第一次蒙古大会”决议，把应征士兵按期送来入伍，只有乌珠穆沁右旗，因为保安队官佐都青阿、敖恒等反对征兵，在该旗蒙民中散布怨言说：“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，是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结德王、吴鹤龄等投靠日本，扩编军队之所致，我们应当反对。”号召被征旗民杀害托克托胡，因托克托胡事先得讯逃避他处，始得幸免。继而都青阿、敖恒等又率领被征旗民到索王府请愿，要求免除兵役。这时索王正病重，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

劝说，才将这事平息，不久索王也就病故。（五）乌珠穆沁右旗官员们为了应付差事，于是年冬特在林西一带雇佣些兵痞，代替该旗应征旗民入伍。李守信见着我说：“我的林西旧部属都来了。”我对该旗这种应付差事的做法很不满意，严令该旗务要依照“蒙古大会”决议，把应征士兵送来。该旗官员们迫于我的命令，又设法说服了都青阿、敖恒等，率领应征士兵，前来我旗西营盘入伍。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后，在征兵问题上遭到乌珠穆沁右旗反对的一段经过。当时我很不满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，强行征兵要马，招致蒙古人民的反对是应该的，也是必然的。

#### 和伪满洲国及“冀东”缔结协定

在“外交”工作上，主要是和伪满及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缔结协定。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，田中隆吉就向我建议，应和“满洲国”缔结协定，我即偕同李守信、吴鹤龄、金永昌、陶克陶、卓特巴札普、雄诺敦都布、索特那木道尔吉等，分乘飞机二架赴长春。

到达后，先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，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、外交部大臣张燕卿、宫内府大臣熙洽、军政部大臣于深澄、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等，无非是周旋与宴会。继而就和伪满外交部谈判缔结协定问题，计日本关东军方面参加者有田中隆吉，专田参谋；伪满方面参加者有外交部大臣张燕卿，次长大桥忠一；伪蒙古军政府方面参加者有我和陶克陶。谈判开始时，首先由我和张燕卿分别致辞。张燕卿在致辞中，强调应以日本为中心，达成“满蒙合作”。我在致辞中，着重从过去历史和当前局势，说明“蒙满合作”之必要。接着就进行讨论，在政治、经济等问题上，没有什么分歧，仅在军事问题上有点争论。我提出“蒙古军政府”甫经成立，实力未充，如果受到威胁

的时候，请“满洲国”出兵援助，当威胁解除的时候，“满洲国”即应撤兵。大桥忠一争辩说：“从外交惯例上说，‘满洲国’为了援助蒙古，实行出兵或撤兵，应当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定，不能你们叫我们出兵就出兵，叫我们撤兵就撤兵。”田中隆吉插言说：“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吧，本着‘满蒙亲密合作’的精神，按照德王的意见办理也无不可，我看就这样办吧。”因为田中隆吉知道，伪满蒙缔结协定，不过是走形式，出兵或撤兵还得由关东军作最后的决定。谈至此就告结束了。

又经分别酝酿协商，结果缔结了以共同防共、军事同盟、互派代表、经济提携为内容的“蒙满协定”，由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签字，由张燕卿代表伪满洲国签字。这个协定的内容，大致如上所述。因协定原件，在化德退却时丢失，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。嗣即根据这个协定，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伪蒙代表，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伪满代表，双方开始建立了“外交关系”。同时，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，发行伪满币，在伪蒙古军政府行政力量所及的地区，流通使用，由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。这次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外交部，还派员陪同我们到奉天参观兵工厂，在东陵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。旋又到大连游览，到王爷庙访问。缔结协定后，我单独一人去见了伪满皇帝溥仪。关于我和溥仪的关系，下面再谈。

我同伪满签定协定后，返回化德不久，田中隆吉又向我建议，应派“外交署长”陶克陶赴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缔结协定，好向他们交涉支援经费。于是我又派陶克陶代表伪蒙古军政府赴“冀东”与汉奸殷汝耕谈商，结果缔结了以“政治上共同防共，经济上互相支援”为内容的协定。田中隆吉即根据这个协定，从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弄到 100 万元，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。

## 我与溥仪的关系

在这里，需要补述我和溥仪的深切关系。

在我年轻时期，因受封建社会遗毒很深，忠君思想至为浓厚。但我承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之后，已人民国时代，无君可忠，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的身上，非常盼望溥仪复辟。记得我 16 岁时，我的姐夫穆特赉阿任察哈尔十二旗群的巡防马队统领，掌握数百蒙古骑兵，参加了张勋复辟活动。有一次他和我说：“我不久就到北京保护皇上登基，你有什么奏折或对皇上有说的话，我可以替你转奏。”我当时因为年轻，没有做出什么表示，后来张勋复辟失败了，穆特赉阿逃到外蒙古避难，株连他的兄弟六人被杀，我还深以在张勋复辟事件中，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憾事。

迨至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，溥仪迁到北京日本公使馆避难时，我曾偕同补英达赖去北京，通过外蒙古驻京王公那彦图的介绍，去见溥仪。因溥仪正准备转赴天津，仅得一面，未得多谈，聊表慰问之意就辞出了。我和补英达赖就急忙返回张家口，向商家筹款一万元又到北京，前往日本公使馆，见到了溥杰，表示愿到天津面见溥仪。恰巧这时溥仪从天津来电话，向溥杰询问他母亲的疾病，溥杰趁便在电话中转达我的意思，溥仪答称：“可以前来相见。”我遂和补英达赖把一万元纸币用布袋缠在腰中，外穿宽大衣服，密赴天津，住在华石斧家。经过接洽联络，在日“租界”张园见到溥仪，当将所带一万元进献，并致慰问之忱。所得的是数句奖勉之语和赏喝牛奶一杯。但我毫无不满之心，还以为在“皇上”蒙难之时，得尽献款之诚，是为臣属应尽的义务，感觉无上的欣慰。在溥仪当上伪满皇帝后，我特穿上清时的蟒袍和马褂，戴上朝珠与顶戴，拍照叩拜的跪像，派我旗协理钟昆赴伪满送给溥仪，表示尊君的“忠心”。我于 1935 年冬赴长春

和日本关东军接洽时，先和溥仪的侍从武官张海鹏见面，谈到张勋复辟失败，不胜感慨，谈到“皇上”又复“登基”，无限欢欣。接着又见了溥仪，行了叩拜礼，于心甚慰。

当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到长春来“缔结协定”，本有“两国相交”的意味，应当尊重自己的“身份”。但顾念过去的关系，对溥仪个人仍愿以“君上”事之，以“臣属”之礼相见。因此，当我单独见到溥仪时，还是行了叩拜礼，溥仪也挥手让座，温语相加。我们二人面对面地谈了很多的话，内容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了。嗣我看见侍从人员均已退出，只有我们二人在座，又向他说：“日本人对皇帝怎样？在我们那边，日本人气焰嚣张，仅是一个化德县顾问小林，竟敢拒绝腾房，阻挠军政府的筹备，对于往来化德的蒙人，也横加干涉，不予便利，使我非常气愤，曾向田中隆吉提出不要小林顾问。田中隆吉答复我说：‘小林顾问不好，改就行了，何必不要他。’我又反驳说：‘你们日本人不好，改了就行，为什么我们蒙古人凌升有错就杀了呢？’”溥仪说：“你这话太硬了。”谈至此我即辞出归寓。

接着田中隆吉来和金永昌等商量，说溥仪要封我为“亲王”，征询叫什么亲王好。金永昌说：“封为武德亲王最适宜，因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圣武皇帝的武字；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，把武德二字结合起来，是表示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伟业的意思，一定适合德王的胃口。”于是田中隆吉就采纳了金永昌的建议，转知“宫内府”办理，溥仪又召见我，亲自授予“武德亲王”“钦任状”，我即拜领接受，表示谢恩。我返寓后，仔细看看这个“钦任状”，上面还有溥仪的署名，我很奇怪，怎么皇帝封号还自己署名呢？认为不合前清封王只盖大印，皇帝不署名的惯例，足见这个不伦不类的“钦任状”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，不是溥仪近臣的主意。这时吴鹤龄也知此事，带有不满的神气对我说：“这时封你为



‘武德亲王’有什么用处？还不如赠给你一枚勋章，表示‘蒙满亲善’，符合国际间的礼节。”我当时对吴鹤龄虽没说什么，而脑子里却在这样想，这个“武德亲王”，必要时也有用处，如对守旧的老年王公杨桑等宣扬一下，很可利用溥仪的“钦封”，提高我的身价，把向以前辈自居的老年王公杨桑等的气焰压下去。我虽有这个想法，但这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伪蒙古军政府的军政大权，杨桑等对我也比以前尊重，不再遇事阻挠，我也就没向他们宣扬此事，遂把这个“钦任状”束之高阁了。后来我又去伪满“访问”，拜见溥仪时，对他作了交代说：“现在皇帝在日本帮助之下，已经登基，再也用不着我效力了，我今后把忠于皇帝之心，忠于蒙古事业。”溥仪也以“贵宾”之礼待我，宴会时，口称我为“贵主席”了。

#### 关于“凌升之死”

上面我谈了一些我和溥仪的关系。顺便谈谈关于凌升之死的问题。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日，在我旗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后不久，田中隆吉又来我旗，商洽扩编军队之事。提到所需经费时，他说：“蒙古统一指挥机构已经成立了，亟须筹措经费，现在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通苏案被捕，听说他的财产很多，可以没收他的财产，作为军政府的军费。”我当即拒绝说：“凌升被捕，对于蒙古人心和西进工作都有影响，最好不要严究，应当从宽发落。至于我们所需经费，蛮可设法另行筹措，绝不愿把没收凌升的财产充作我们的经费。”田中隆吉见我不但不愿接受这样来路的筹措经费，反有营救凌升之意，立刻转了话锋，向我解释说：“凌升虽然被捕，我想康德皇帝出头一说，也就没事了，希你放心。”谈至此，他即告辞而去。

同年4月24日，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伪蒙古大会，准备正式改元易帜，成立伪蒙古军政府，当时我和索王、卓特巴札

普、吴鹤龄等提出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，要求释放凌升，预定关东军代表到达后，即提出这一问题。在大会进行中，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、横山顺等赶来参加。刚下飞机后，吴鹤龄就将大会准备给关东军打电报、要求释放凌升情形，向田中隆吉等报告。田中隆吉答复说：“时间来不及了，大概今天就把凌升处决了。”接着他到屋里又继续解释说：“对处决凌升，本来我是不同意的，在关东军参谋会议时，曾讨论处理凌升问题，我这主管蒙事的参谋主张不杀，把前次你和我说的‘应当从宽处理凌升，以免影响西进工作和蒙古人心’之言都说了。但是主管关于苏联事情的参谋都主张杀，最后实行表决，我是少数，只有服从多数，结果就决定把凌升处以死刑。这是我们内部处理凌升的经过情形，我都明白地告诉你们。”我们听他说明以后，认为既已把凌升处决，没有再向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，仅在会外时间告知了大家。索王、卓特巴札普等，都和凌升有交情，闻听之后，不胜叹息。嗣后陶克陶向我说：“田中隆吉和横山顺闲谈时说，杀凌升的事，对西蒙人的印象很不好。”

“蒙古军政府”成立后，我偕同李守信、吴鹤龄等赴长春，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与伪满缔结了一个所谓“满蒙协定”之后，即到大连参观，曾和业喜海顺（业王）见面，招待我们参观的日本军官小野寺问业王说：“业王爷对蒙古事情有什么意见？”业王说：“蒙古事情我不知道，我只知有满洲国。”当时使我甚感诧异，一向好谈蒙事的业王，现在也守口如瓶，表示冷淡。这充分说明凌升被杀后，东蒙王公明哲保身、惧怕日本、应付场面的心理。

改化德县为“德化市”

在“内政”上，首先将化德县改为“德化市”。关于化德县设置问题，我从前就曾表不过不满，因为化德县所在地原叫嘉卜

寺，正和我旗接壤，而我的名字汉语译音是德穆楚克栋鲁普，人又称我为德王，头一个字都是德字，如果仍称化德，就意味着我为这块地方所化；如果改称德化，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为我所化。在百灵庙“蒙政会”时期，包悦卿曾将我不满化德二字的意思，向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亲信萧振瀛提过，萧振瀛当向包悦卿解释说，化德县这个名称是从崇礼、尚义等县次第排列下来的，绝无化及德王、侮蔑德王的意思。既然德王对“化德”这个县名有意见，我马上建议宋哲元主席更改，希你转向德王解释，不要误会。果然为时不久，我就接到国民党内政部的通知，说将“化德县”改为“新民县”。但内政部虽有明令更改，因“察东事件”已经发生，没有来得及更改化德县的牌子，当地人仍称化德县。因此，我于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，就决心将化德县改为“德化市”。并因卓特巴札普对此有意见，特派吴鹤龄前往明安旗卓特巴札普家中，婉言劝说疏解，卓特巴札普始答应将化德县从察盟划出，改称“德化市”，归由伪蒙古军政府直辖。我遂任命李守信兼任伪市长，张子荣（卜琳弼里格图）为伪副市长，听从伪军政府直接指挥，管理“德化”市政。

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和伪蒙古学院

其次是正式成立伪蒙古生计会，发表吴鹤龄兼任“会长”，并把募得雪灾救济款悉数拨作该会基金，由吴鹤龄负责主持设置“德化商店”，收购灾民的牲畜皮张，转售部队制作军装，筹划集结灾民组成救济新村和重点植树造林等事。不意因此却引起陶克陶、金永昌的不满。他们向人发牢骚说：“这笔资金，是我们到‘满洲国’募得的救济雪灾款，曾向‘满洲国’各界呼吁救灾奔走募集，并向国务总理大臣鞠躬致谢，尽了很大的努力，受了很多辛苦，费了很多唇舌，为什么现在归由吴鹤龄掌握？究竟如何花用，应当问个明白。”并带有不满的神气前来质问我。我当时

不由得也就无名火起，顺手把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摔碎，很生气地说：“仅仅这一点灾款的处理，你们都不信任我，居然提出质问，今后怎样共图大事！”金、陶二人碰了我的硬钉子，也就神色黯然而退。由于我对吴鹤龄的支持，虽把金、陶的气焰压下去，但因此却引起金、陶和吴鹤龄之间的勾心斗角、争夺权利的矛盾与冲突。

其三是设立伪蒙古学院，任命郭尔卓尔札布为“院长”，陈绍武兼教导主任，分设师资、电报、补习各班，招收蒙古族青年施行短期训练，培养急需的干部。同时在张北设立伪察哈尔青年学校，聘任日本人为教官，侧重用日语教学，进行奴化教育。并由伪教育署主持，选送留日学生。计有胡尔钦毕力格、博和温都苏、卓里克图、都固仍仓、赛春阿、都格尔扎布、德勒格仍贵等十名，被送往日本东京，先在“善邻协会”补习日本语文，继即分送日本大专学院深造，培养通晓日语的各项“人才”，促进“日蒙亲善”。还在“德化”设立“蒙日语文讲习所”，鼓励职员学习蒙日语文。

汉奸王道一的下场，日寇以杀人为儿戏

在治安上，“德化”特务机关长田中玖，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，招募当地土匪头子王道一，企图用以扰乱绥东治安，作进犯绥远的前哨。不意王道一率领匪众投归日本后，在扰乱绥东方面未起多大作用，反在尚义一带为非作歹，影响后方治安甚大。田中玖为了笼络当地人心，使对日本有好感起见，特将王道一诱捕枪决。这是王道一做汉奸的下场，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，汉奸如不为其所用，便置之死地。又据伪军法处长关荫南说，在未挑起绥东战争以前，唯恐在押的军事犯扰乱后方，日本关东军密令指示伪蒙古军的大桥雄熊参谋，亲来通知关荫南，将寄押在张北监狱的 91 名军事犯，开具名单，宣布罪行，一律执

行枪决。关荫南认为其中有的军事犯系属轻微犯罪，仅判六个月徒刑，已经在押三个月，再有三个月就可释放出狱，恢复自由。对这类罪犯如也执行枪决，未免冤屈，引起官兵不服，而致动摇军心，反为不美。大桥强调这是关东军的命令，必须执行，不能变更或拖延。又经商讨一番仍由大桥提出意见说：“为了执行关东军命令，只有将 91 名军事犯绑赴人烟稀少的张北山下行刑，在行刑前一律松绑，任其散漫乱跑，后边用机枪扫射，跑了的就算跑了，打上的活该命死。这样处理既可使一部分罪犯获得活命，也算执行了关东军的命令，你我严守秘密，不可对外言说。”关荫南认为再强调原来意见，也是无用，只好同意这个办法。这样执行结果，仍然打死了 19 名，其余 72 名四散逃逸。由此可见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，草菅人命。而日、伪执行人员也就视人命为儿戏，任意屠杀。

#### 设俱乐部，公开烟赌

日本帝国主义者虽以“确立后方治安”为名，任意屠杀，但另一方面却在各县城镇设立俱乐部，公开聚赌，抽取头钱，名义上是作特殊用途的开支，实际多饱充了经办者的私囊。并公开卖鸦片，毒害人民。由于烟、赌的公开，聚集很多游民，不分昼夜，呼么喝六，吞云吐雾，一塌糊涂，弄得鸡犬不宁，秩序紊乱。而无辜人民因而倾家荡产者有之，投河上吊者有之，卖妻鬻子者有之。身体羸弱者更不知凡几，贻害人民，莫此为甚。当时有人出面反对公开聚赌，主张取缔俱乐部，而主管其事的日本人反说中国人天性好赌，设立俱乐部，正是投其所好，满足需要，并可从中抽取头钱，增加税收，作特殊用途的开支，拒绝取缔俱乐部。实际上，日寇是想用烟赌毒害中国人民，使之意志消沉，身体衰弱，不思反抗日寇，不战而亡我中华民族，其用心十分狠毒。

## 进犯绥远的部署

1936年10月间，“德化”特务机关长换成田中隆吉。他指使王英组织的所谓“大汉义军”已经初步编成，而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，便主张并要亲自主持进犯绥远。他和我说：“九一八事变时，东北军一打就跑，我们没费多大力量，就占领了东北四省，建立了‘满洲国’。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，可能一吓唬就跑，很快就能拿下绥远，可速责成陶克陶组成接收委员会，准备接收吧。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，利用汉人打汉人，你们蒙古军督后，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，即或发生冲突，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。”我当时认为他的看法也有可能性，并为了早日占领绥远，实现建立“蒙古国”的妄想，也就赞同田中隆吉进攻绥远的计划。王英是志在河套，企图早日当绥西的一路诸侯，表示愿意承当打前锋，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便确定下来。接着，田中隆吉就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，由我命令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第一军进驻南壕堑，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，把伪蒙古军五、六、八、九各师布置在尚义、“德化”一带，守护后方。这时把百灵庙视为后方军事基地，除其他军需器材不计外，仅面粉一项，就运去两万多袋。在派遣驻守百灵庙部队问题上，我曾很费踌躇。先想派战斗力较强、由东北各旗招来的士兵编成的师前去，深恐纪律不好，在乌盟蒙民中造成不良印象。经反复考虑，认为百灵庙虽是后方军事基地，而名义上仍是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“蒙政会”所在地，傅作义不会派兵来打，于是就把甫经编成的伪蒙古军第七师派去。因为这个师的士兵，都是从“察盟”各旗征来的蒙民，虽训练较差，战斗力较低，而纪律好。结果把第七师派去后，并把原派的包俊山所带的一连调回。

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

这样部署之后，我就以我为伪蒙古军总司令、卓特巴札普为

副司令的名义，于 1936 年 11 月 5 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。这个通电是由吴鹤龄起草的，其全文如次：

绥远省政府傅主席勋鉴：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、县以来，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，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。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，乃于前年要求自治，当承中央之援助，准予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，颁布自治原则八项，蒙众欣慰，举国同情，而独贵省始终猜忌，另眼相加，屡次企图破坏自治，其最显著者列举如次：

（一）贵省各项税收，关于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部份，依中央颁布之蒙古自治原则，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。当时蒙政会为谋地方之和洽，谅解贵省之困难，仅要求在百灵庙蒙政会统辖地方劈分特别税。中央对这项特别税，曾有分配命令，贵省竟擅自变更划线，夺去丰镇、兴和、集宁、凉城、陶林等五县税收，借口多端，曲解明令，经议年余，分文未给。当时中央对贵省已分配特别税，举办各种事业，而蒙政会因未得税收，以致经济困难，原定各项事业，不能举办。贵省对蒙古地方自治，如此暗中破坏，早已引起蒙古民众之不满。

（二）前年所发生之西公旗事件，纯粹是蒙古内政问题，蒙政会责成主管盟长和平解决，乃义属当然，而贵省独越权干涉，操纵石王，扩大事态，纠纷不已，企图分化蒙旗，推翻自治之居心，不问可知。今春蒙政会奉中央明令，撤回驻在西公旗之保安队，以免发生冲突，并请中央转令保护麦力更召活佛尼达克丹大喇嘛。不意数月后，大喇嘛及其家属从众，被贵省派兵袭击，竟致杀害。如此破坏蒙古自治荼毒蒙人惨剧，凡属蒙族，莫不痛心。

(三) 蒙政会保安队系呈请中央编成，专负保卫地方之责，何等重要！而贵省今春竟利诱该队中不良分子起而叛乱，收归贵省，更于前月装备叛乱官兵，诡称反正，进攻百灵庙，企图毁我自治发祥地，为各旗驻在百灵庙之保安队击退。当由贵省派兵掩护，酿成叛兵互相仇杀，死伤数百名之多，贵省利用无知蒙人，客留贵省，仇视蒙人，为何如此之甚！

(四) 百灵庙蒙政会系全蒙自治机关，深受中央扶植蒙古之至意，全体蒙人视为第二生命，凡属人类，对之莫不寄与同情，不忍加以危害。独贵省阴谋破坏，居心推翻，甚至捏造是非，耸动中央，擅用乌、伊两盟名义，淆惑中央视听，从而产生绥境蒙政会，以致我蒙经营多年之百灵庙蒙政会，归于毁灭，引起蒙民丧失对中央之好感，似此误国殃民之举，令人太息痛恨！

(五) 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，我蒙对贵省并未究明是非，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，主谋系出贵省，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意志，终于在锡盟盟长公署所在地，成立察境蒙政会，清理百灵庙蒙政会之债务，隐忍退让，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。而贵省对我蒙反倒愈加压迫，在察哈尔西部一带，百灵庙以南地方，挖掘战壕，修筑炮台，作种种军事上之设施，给锡、察两盟及百灵庙一带无辜蒙民生活上以严重压迫，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。

总之，蒙古愈退让，贵省欲压迫，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，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，争取最后生存。本会同仁始终以和洽地方为重，只有一线和解之可能，绝不能轻启战端，累及民众。特提出下列要求，希贵省谅解，迅作答复。

(一) 察哈尔右翼四旗，原由察哈尔部管辖，现在该部



依中央颁行之蒙古自治原则改盟。为该盟土地之完整及锡、察两盟民众到绥东五县（丰镇、兴和、集宁、凉城、陶林）地方，买卖粮食、煤炭、牛马、皮毛等便利计，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，退还察哈尔盟，归本会管辖，以资名符其实。

（二）百灵庙蒙政会结束工作，尚未完竣，留有职员及保安队数百人，为安定所留员兵和附近居民之人心，免除其生活上压迫起见，请将百灵庙以南一带地方军事设备、经济封锁，即日取消，恢复原来和平状态。

（三）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原有之步枪、轻机关枪及弹药，均属中央发给。今春贵省煽动该队叛乱时，将武器押收归绥、武川等处保管，应即如数退还百灵庙蒙政会。

（四）现在百灵庙蒙政会整理债务之结果，所欠员兵俸给及商民债款计达 20 万元，是项巨款蒙地无所从出，中央拨给也有困难，贵省年应劈给蒙古之特税 20 万元，应速发给。

（五）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各员，蒙政会已发有逮捕令。现在该员等均在贵省任职，证明当时兵变确属贵省唆使，希将各叛徒一律遣返百灵庙，以便处分。贵省袭击麦力更召及惨杀大喇嘛之官兵，均属杀人凶犯，应一律撤职查办，以明法纪。对以上两案前后受害之数百蒙人及其家属，一律发给抚恤金，以慰冤魂。

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之要求，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克期实行。否则蒙古虽弱，亦做最后之抗争。如演成事变，责任完全应由贵省负担。特此电达。

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、

副委员长卓特巴札普歌

（十一月五日）印”

## 傅作义的复电

这个电报发出后，旋即接到傅作义的复电如次：

嘉卜寺察境蒙政委员会德委员长勋鉴：歌电阅悉，自来辩论事理，有强辩夺理者，亦有颠倒是非者，接诵大电，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，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，幸详查焉。

（一）绥特税系代中央征发军费之税收，自治八项原则劈分地方税之规定，该税本在不应劈分之列。北平军分会特示优待，派员调查，规定五项办法，贵会迄未实行，是贵会不肯按中央规定而劈分，并非绥方不予劈给。至商驼改道，系因贵会拦路苛征，自断商运，具有事实可指。

（二）西公旗事件，第一阶段由于贵会派兵帮助叛逆曼头围攻王府，并有来历不明之飞机助战，致该旗横受糜烂，中央命令撤兵，贵会均未置理。第二阶段本章大喇嘛等返庙，与石王等已订约相安，不知何故，当王道一扰犯绥东之时，该喇嘛忽勾结非本国国籍人，在麦力更召招兵运械，建筑机场，意图与绥东王匪相呼应，大喇嘛于八月八日攻击王府，而石王十三日始行反攻，当战争结束，确有非本国籍人在内，此事谁违中央，谁肇乱源，社会周知，勿烦曲解。

（三）百灵庙保安队哗变，系在察北改元易帜之后，时间事实，昭昭于社会，该青年等为执事平日所培植，其思想行为度为执事所深晓，中途脱离，当自有故，云等通电对执事在察北行动表示惋惜，而誓不合作，执事更应自省，不尤他人。

（四）绥蒙易制，也在察北变乱之际，尔时乌伊官民既畏丧失国土，貽蒙古之害，又不愿与地域不同者共此多事岁

月，中央俯顺多数蒙人之情，始行分治，目下旗众相安，边防无恙，与察蒙相较，自有真正得失。

（五）分治命令既颁，贵会既不通令迁锡，复在六县易帜改元，组织军政府，接引伪蒙军入察，近又向庙会大批增兵，乃来电云“本其服从中央之素志，以地方和平为重”，且责绥方自卫之不当，似言行不无矛盾。以上就见质敷陈其要，至对来电要求及期待于左右者，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，察北今日成何局面？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，相安无事。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，该四旗官民始惶然呈请中央，颁定改隶之令。执事对义既有期勉，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，倘执事以国家为重，使察北六县仍归察省管理，恢复旧规，则虽中央明令在前，悬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，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。盖今日边土安危，责在执事，而不在义，义服务国家，只知有公，不知有己，同在中央隶属之下，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。执事如摆脱现状，不受利用，幡然有所表现，则往日之罪，义当负之，愿即负荆以请，并立解职，以明心志。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，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作爱国之事。刻所罄祝者，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，勿义免过而执事有负于国。时迫事急，祈执事熟思而力图之，国家幸甚！边防幸甚！

绥远省政府主席 傅作义庚（八日）

如意算盘没有打对

这时蒋介石也来电报指责我，电文内容大意是：“披阅歌电，不胜诧异，台端在电报中所述各节，多属绥境蒙政会之事，应由该会与绥省商洽解决。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，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，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。今竟陈兵相见，台端所谓积

年倾心内向者，不知将何以自解？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，即日停止军事冲突，听候中央处理。”这时前方军事业已接触，意在拿下绥远再说，对蒋、傅来电再未置复。田中隆吉还从伪满航空株式会社调来几架飞机，盘旋空中，侦察助威。

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指挥者，我和王英是这次战争的仆从和附合者，特别是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心理对待这次战役的。认为上有飞机盘旋，下有王英部队攻打，后有伪蒙古军督战，这样虚张声势地一威吓，傅作义军队就可以撤退，大则可以唾手而得绥远，乘胜西进，小则也可以扩大占领区域，而壮声威。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，绥省方面既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的兵力，又有国民党晋军的支援，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，而伪蒙古军是新经编成的，训练很差，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队又属乌合之众，战斗力更差。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“大汉义军”的兵力至多不过一万五千来人。日本帝国主义者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导官，并未开来大批日军相助。从数量上看，是众寡悬殊；从质量上看，是优劣分明。因此，由雷中田率领进攻红格尔图的王英部队，围攻数日，未能得逞，迨至绥方援军到后，进行反攻，王英的部队便败退下来，集结在商都休整，李守信立刻派尹宝山率领伪蒙古军部队进驻商都，和傅作义军对抗。

### 百灵庙战役

这时我得到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的报告，说是傅军孙兰峰旅，正在百灵庙以南集结，等候炮兵部队一到，就可能进攻百灵庙，伪蒙古军第二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百灵庙。我接到报告后，认为烟草谷让死守百灵庙，命令不妥。因为新经编成的伪蒙古骑兵，不能死守百灵庙，应乘绥远军不备之际，进行奇袭截击。我很想乘坐飞机前往百灵庙布置，只因有紧急事务待

办，未能及时前往。到了这年 11 月 23 日晚，孙兰峰旅就进攻百灵庙。“蒙政会”汽车司机张岱带着一架机关枪在南山头上配合部队射击，松秀带着伪蒙古军游击队（系迪克丹大喇嘛死后逃来的士兵编成的）在康熙营盘一带山上守护，其他团队亦准备迎击。不意驻在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首先逃跑，遇见松秀下山领取子弹，误认为有变，竟开枪打死，这时四面枪声顿起，百灵庙遂入混乱状态。伪蒙古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和第七师长首先退却，所属官兵也随之溃退，第七师野崎顾问说他是最后撤退的，并说用刀劈了一人，究竟所劈何人，没有说明。第七师官兵退却后，集结在锡拉木伦庙和希拉图庙两地休整，百灵庙遂为傅军占领。

#### 石玉山金宪章等反正

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，又令集结在商都的伪军王英部队，再攻百灵庙。而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“自告奋勇”，情愿率队前往，不意这时伪军石玉山、金宪章旅长等，已和傅作义有了联络，待机而动。他们到达锡拉木伦庙时借故未往。雷中田仅率一千多人，再度进犯百灵庙。雷中田虽然“立功”心切，还给我来信，自称“卑职”，以明心迹，但其士兵看到送他们的汽车均已开走，是不管他们的死活，因此都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，果然一经接触，即行败退，雷中田当场被击毙。败退官兵也到锡拉木伦庙集结。这时我不愿意第七师和王英部队混合驻扎一处，除派伪军事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该庙，慰问部队并查清情形联络部署外，特电令穆克登宝，将该师驻在锡拉木伦庙的所部官兵，调到布拉图庙集结，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坚不许可。穆克登宝陈说，这是奉“德总司令”的命令，正在指挥部队开拔之际，第七师野崎顾问竟抽出军刀进行威吓说：“驻守此地的部队，都归小滨大佐统一指挥，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命

令，否则就以军刀相见。”穆克登宝在野崎威吓之下，马上软化了，不敢再力争，只有俯首听命，把我给他的命令抛在脑后。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服从，而小滨大佐对穆克登宝却不信任，当将第七师在山上和要路所布置的岗哨，一律换成王英部队的士兵担任。这时王英部队的旅长石玉山、金宪章等，既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屡吃败仗，前途渺茫，又受傅作义的策动，遂乘步哨更换之际，发动所属官兵暴动起义，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二十余人全部枪决，并袭击驻在该庙的第七师官兵，连长李春林、若格尔札布等和数百士兵，均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死亡，石玉山、金宪章遂率领部队投归傅作义。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，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偷偷地溜走，不但得了活命，还发了一笔横财。他谎报军饷在战乱中丢失，后来用此款买了一辆全新的别克牌汽车。第七师在这次变乱中死亡数百官兵，蒙受很大损失，我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，他们编出歌谣来咒骂我们。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绥东战役得到的结果。

锡拉木伦庙事件发生后，前方战事既然失利，后方军心也多不稳，田中隆吉正拟弃守“德化”，反而欺骗我说：“我们日本军快来了。”我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田中隆吉说：“真的！真的！日本军快来了。”田中隆吉不但欺骗我，也用欺骗的手法拉拢李守信。有一次，他对李守信说：“你叫李守信，我叫李守义吧，我们是情同骨肉的亲兄弟呀。”这充分说明，田中隆吉为了拉拢人欺骗人，什么卑劣的伎俩都能使出来，我却甘受田中隆吉的欺骗而不觉醒，反认为田中隆吉比别的日本人强，对蒙古甚为热心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愚不可及。

#### 西安事变后缩编伪蒙军

正在田中隆吉仓皇失措，对我们欺骗拉拢之际，不意发生了“西安事变”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，实行兵谏抗

日。田中隆吉得到这个消息，喜出望外，在一天黎明的时候，他仅穿裤衩，披着大衣，到伪军事署向王宗洛说：“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，中国从此要发生内乱，对我们作战前途有利。”旋又到了我的住室，报告了这一消息，并征询我对“西安事变”的意见。我即将吴鹤龄请来共同商量，田中隆吉极力主张给张学良打电报，杀了蒋介石。我和吴鹤龄一致主张说：“现在前方战事失败到这个样子，后方军心也有动摇，与其劝张杀蒋，莫如趁此机会呼吁停战言和，作为缓兵之计。”田中隆吉见我俩不同意他的意见，也就转了话锋说：“这样也好。”于是就由吴鹤龄拟具电报稿，记得内容大意是指责张学良、杨虎城容共抗日，劫持最高领袖，紊乱国家纪纲，因此，特呼吁全国一致声讨，营救“领袖”。并呼吁在“领袖蒙难”之际，停止蒙绥地方之争。“西安事变”解决后，傅军即停止进攻，伪蒙古军也退守原地，双方进入相持状态。

这时日本关东军把田中隆吉调走，派来第二科科长武藤章主持“德化”特务机关，就和我研究整顿部队问题。他主张把伪蒙古军九个师缩编为六个师，每师配备一个山炮连，以便集中兵力，发扬骑炮兵联合作战的效能，并答应每师拨给四门山炮。当时我也认为武藤章的主张有道理，合乎军事原则，而且蒙古军还可能多得几门炮，用以加强部队的编制装备。但我总想扩编伪蒙古军，不愿缩编，并感缩编各师之后，人事上不好安排，因而同意每师配备炮兵连，不同意缩编为六个师。武藤章见我坚不同意，再未强调缩编，也未配给山炮就回去了。关东军另派森岗大佐继任“德化”特务机关长，为时不久，“德化”特务机关长又换成河崎大佐，这时因为部队中既有金宪章及石玉山等反正，其他部队也有不稳状态。我向人表示：“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，谁对蒙古有利，就跟谁合作。”这话也许传到了河崎耳朵里，因此，

河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：“蒙古只能和日本合作，不能和别人合作，假如有人认为蒙古既可跟日本合作，也可和别人合作，甚至与苏联亦可合作，那可不行。”从河崎这几句话里，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把蒙古视为禁脔，不容他人置喙，特别注意防止苏联的影响。这是对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。实际上我当时认为，苏联是可怕的，像我这样封建王公出身的人，当时是决不会走苏联这条道路的。我感觉河崎有点神经过敏，很想上台讲话驳他，但是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
河崎大佐到任后，对于配发伪蒙古军山炮问题，未曾提及，我也再未追问。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机构问题，特在伪蒙古军政府之下，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，仍由我任总司令，李守信任副司令，任命乌云廷为参谋长，刘星寒为参谋副长，其下设副官、参谋、军需、军械、军法、军医等六处，副官处长张启祥，参谋处长崔守堃，军需处长崔景岚，军械处长纪树勋，军法处长关荫南，军医处长李××。并为了简化层次、便于指挥起见，将伪第一、二两军编制取消，由伪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，并将部分师长作了调整，因第六师长宝彦图和李明远意见不和，都调任参议，另派乌云飞继任师长，把警卫师改称第九师，第七师因在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伦庙变乱中损失甚大，师长穆克登宝撤职，另行补充训练。对其他各师也进行调整，准备待机而动。

七七事变以后一度撤出“德化”

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进攻平、津、华北，对内蒙古方面还未派来大批日军，绥远方面傅作义军趁此时期却展开进攻。由董其武率领部队进攻商都，商都伪军尹宝山率队迎击，战斗甚为激烈，双方均有伤亡，终因傅军攻城甚急，尹宝山被迫撤退，商都遂为傅作义军占领。尹宝山在撤退途中，并得泉团长又率队反正投归傅作义，这对伪蒙军事方



面又增加了不利影响。这时反正的石玉山率部进攻“德化”，察省主席刘汝明也派部队进驻万全坝上，军事形势顿显紧张。关东军特把田中隆吉（这时任联队长）从朝鲜调回来，主持军事，急忙采取紧急对策。对刘汝明方面，听说田中隆吉秘密进行联络，允给四门大炮，才缓和了刘汝明派队进攻。但石玉山部队却逼近“德化”，而驻守“德化”的伪蒙古军，仅有包海明率领的第九师少数部队。我当命令王宗洛武装军政府职员，帮助第九师防守“德化”。日本特务机关首先焚烧文件，纸灰飞扬，汽车发动隆隆作响，显是作退却准备，因而谣言百出，秩序大乱，无法维持，于是我又下令叫王宗洛带同伪蒙古军政府职员，向察盟镶黄旗撤退。吴鹤龄掌握着伪蒙古生计会汽车，于兰斋掌握着伪交通署的汽车，纷装物品，争先撤退，各机关职员更为动摇，有的领了枪支争抢汽车撤退，有的顾不上领枪也随着撤退。先于8月14日晚，向察盟镶黄旗拉白庙撤退，继即撤到多伦。我于大家撤退的翌日上午，曾由包海明陪同视察山上工事，下午我才偕同徐荣侯（时任滂江电报局局长）返回我旗。徐荣侯说：“没有什么动静么，怎么都撤退了呢？还没到最紧急时期，这个也撤退，那个也撤退，成什么样子！”

在大家撤退之后，包海明仍率第九师少数部队防守“德化”，嗣因石玉山部队愈益逼近，已听见枪声，也就率队撤退，“德化”遂为傅作义军占领。这次“德化”撤退是非常仓促的，枪支既未全部带出，弹药亦未焚毁，重要文件更未焚毁或带出。甚至把苦心孤诣训练多日的军乐队，也未令其撤退。后来傅军进占“德化”时，该乐队却装备整齐，奏军乐欢迎。

我返旗后，听说马占山率领军队进至土木尔台，深恐进攻我旗，特派赵文儒前往联络，并让徐荣侯、王石青（专聘教我子侄的汉文教师）主持，在我旗挂上察境蒙政会的牌子，权作应付之

计。我这样安排后，即往补英达赖家。途中遇见陶克陶乘坐汽车找我，我遂偕同他一同到补英达赖家中。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达多伦，一下飞机就问河崎大佐：“德王现在何处？”河崎一时答复不出，东条对他痛加斥责，并追问失守“德化”的责任。河崎为了卸责，很可能把失守“德化”之责，推到伪军事署长王宗洛身上。东条旋即派出飞机各处寻我。我乘坐汽车赴多伦，到达哈丹布图庙时，见有飞机盘旋空中，大概就是寻我。但这并不是日本关东军对我特别关心，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初经伸入西蒙之时，急需我这块招牌，作为他们统治内蒙古的工具，一时还不能弃掉。

我到达多伦后，心情是非常恶劣的。认为初和日本“合作”，就遭受惨痛的失败，对日本关东军所谓对蒙古的帮助，有些失望。这时我忽然想起迪力瓦在“德化”和我说过的话：“你如跟日本人合作不来，不如趁早出走，周游世界各国，宣传蒙古问题，把蒙古问题提到国际政治舞台上。依靠世界各国解决蒙古问题，比靠日本一个国家解决蒙古问题好。”我回味迪力瓦这套话，觉得颇有道理，就转和吴鹤龄商量，表示不愿再和日本“合作”下去，想返我旗另作打算，没有把迪力瓦之言告知他。他认为我仍想和蒋介石拉拢，当即劝我说：“你的动作打算，无非是再想和蒋介石拉拢，据我看来，中国是打不了日本的，并且蒋介石并不想认真的打。在百灵庙蒙政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时，我曾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日妥协的意图，向你谈过，并且日本人决不会甘心失败，从此善罢干休。现在日军既已占领平津，预料不久就会派兵到蒙古来。与其等到日本打过来，再与日本合作，那就被动了，不如现在主动地和日本合作下去，看看局势演变，再定行止。”经过吴鹤龄这样“痛陈利害”，婉言劝说，我遂将返旗想法打消。仍又收集“蒙古军政府”的旧部，重整旗鼓，借用多伦喇

嘛庙恢复办公。

“德化”失守后，傅的部队又向前进攻康保，张北方面也有绥远晋军孙长胜骑兵旅对峙。田中隆吉面对这一情况，甚为焦急，特用客用飞机一架运兵，一次空运六名日本兵到达张北，计运了十余次，才运到六十多名。刘汝明听说日本军一到，便将布置在万全坝上的部队撤走，绥远军亦再未向前进攻，张北方面战局暂时又入稳定状态。田中隆吉听信河崎之言，认为弃守“德化”是王宗洛的责任，表示要加以惩治。嗣经王宗洛亲往张北面见田中隆吉，说明弃守“德化”是奉我之命，并非个人擅自主张，田中隆吉始予谅解。

在日寇指挥下进占绥远

到 1937 年 10 月间，大批日本军由多伦正向西开。听说阎锡山因重视山西老家，特把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调往雁门关内，原驻绥的傅、阎军队，即开始准备由察北和绥东撤退。伪蒙军便乘机反攻，我在多伦坐镇，用蒙文编成的密电指挥各师前进。先行集中伪蒙古军的炮兵，把在康保一带的绥军打退，继即占领了“德化”和商都，迫近了陶林。当时率队进攻陶林的刘建华（刘系汉人，蒙名阿木尔，当时任炮兵队长）曾向我说：“我们的炮兵打得很准，在进攻陶林时，一炮打中门炳岳（中央骑兵第七师师长）的司令部，门炳岳着慌即率队撤退，陶林遂为我们占领。”这时李守信率领一部分伪蒙古军进到集宁，我和吴鹤龄、陶克陶亦由多伦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张北。据陶克陶向我报告说：“据田中隆吉表示，他也掌握了绥军撤退的动态，因为他们的译电员能够译出绥军各部队之间的密电，就是你们德王的蒙文密电译不出来，不知是怎么编的。”由此可见，日本关东军不但常听绥军的军事秘密，就是我和蒙古军各师之间的密电也在暗查之列。这充分说明对我仍不放心。后来我为了免除日本方面对我

的怀疑，特将蒙文译电本送给了他们，表示坦白。

我到达张北后，将伪蒙古军政府主要人事做了调整，尽量起用少壮人员，任命陶克陶为办公厅主任，陈绍武为内务署署长，张秉智为交通署署长。并由陶克陶率领职员随军前进，做慰问部队和接收工作。我率领数名职员，前往锡盟和百灵庙一带，会同雄诺栋都布等，发动各旗保安队，组织“蒙古各盟旗联合军”，计划从草原南上进占绥远。很快与伪第九师包海明会合，逼近武川。李守信率领的伪蒙古军，也因傅作义移防山西，地方上仅有“国民兵”等少数部队，乘机向西进攻，仅在集宁、丰镇、旗下营等地发生过一些小的战斗，很快就逼近绥远省城，把日本军抛在后边。这时沿平绥路进犯的日本军，除命令李守信缓向西进外，桑原中佐（驻绥特务机关长）特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见我，叫我通知第九师和盟旗联合军缓攻武川，等候日本军从凉城开到，再一致行动。他们的表面理由是，不要孤军深入，以防不虞。实际上是怕伪蒙古军抢先占了绥远城，丢了日本军的面子。因此我只有等候日本军到达，才于是年10月14日占领绥远省城，10月17日占领包头。同时武川亦为日蒙军占领，我即发表徐荣侯为武川县县长，其他各县由随军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县长。我由百灵庙到达绥远省城时，吴鹤龄、陶克陶、王宗洛、德古来等，已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先期到达，遂和日本方面共同商谈，组织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。这时派遣和马占山取联络的赵文儒，也由包头返抵绥远，向我报告说，马占山表示，决不向苏尼特右旗进兵，并用白缎写了一封信郑重表示此意。随着我军事的进展，马占山率队西撤，我跟他到了包头。由此可见，马占山颇有拉拢我之意。否则，他若当时进兵，占领我的王府是易如反掌的。

总之，我在这一时期中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，开始建立伪蒙

政权，挑起绥东战役。战事失败后，又在“双十二”西安事变时通电拥蒋，指责张、杨两将军容共抗日，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日，卖国求荣，复在绥远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，成为千古罪人，抚今思之，愧恨万分。

（德穆楚克栋鲁普，时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）

抗日战争图书馆  
www.krzzjh.com